



东亚峰会：引领东亚合作发展的重要平台

□马 丽

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是东盟主导下以东亚地区为依托的开放性、战略合作平台，是领导人引领的战略论坛，自成立以来为引领东亚合作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东亚峰会的由来和演变

东亚峰会成立于2005年，现有包括东盟10国（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和美国等在内的18个成员。

东亚峰会是“10+3”合作的扩展。“东亚峰会”的构想可以追溯到1990年12月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前身）乌拉圭回合谈判破裂。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出于对当时欧洲和北美经济区域一体化发展迅速，而亚洲则相对落后，以及东盟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地位和作用不突出等考虑，提出建立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在内的“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但因美国反对及个别东盟成员疑虑而作罢。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东亚各国造成灾难性损失，激发了各国推进地区合作的强烈愿望，成为东亚合作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1997年12月，首届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东亚合作正式启动。1999年举行的第三次“10+3”领导人会议发表《东亚合作联合声明》标志着“10+3”合作迈向机制化。200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第四次“10+3”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东亚峰会的构想，得到新加坡时任总理吴作栋支持。

2001年，由参加“10+3”会议的东西13国26位专家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报告。同年，第五次“10+3”领导

人会议通过东亚展望小组报告，建议推动“10+3”领导人一年一度的会议向东亚峰会过渡。2002年第六次“10+3”领导人会议通过《东亚研究小组最终报告》，“推动‘10+3’领导人会议向东亚峰会演变”是报告提出的九项中长期措施之一。在东盟推动下，2004年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第八次“10+3”领导人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决定2005年在吉隆坡召开首届东亚峰会。

东亚峰会是东亚合作的新起点。东亚峰会的召开是东亚合作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加快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本地区各国相互依存、共同利益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东亚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战略对话论坛的性质定位和东盟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是东亚峰会的两大重要特征。首届东亚峰会通过《关于东亚峰会的吉隆坡宣言》明确指出将东亚峰会建立为一个论坛，就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广泛的战略、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对话，目的是促进东亚的和平、稳定与经济繁荣。东亚峰会将是一个开放、包容、透明和外向型的论坛，东盟将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与其他参加国携手合作，推动加强全球性的规范和国际公认的价值观念。

东亚峰会的运行和发展

东亚峰会是年度领导人会议机制，由东盟轮值主席国主办和主持，与东盟年度首脑会议同期举行，迄今已举行14届。东亚峰会的模式由东盟和东亚峰会其他所有参加国共同审议。一般每年年中举行东亚峰会外长会和高官会，年底举行东亚峰会领导人会议，通过外长及高官会回顾峰会合作，就未来发展方向交换意见。

作为领导人引领的战略论坛，东亚峰会每年都通过或发表数份宣言或声明，为成员开展对话合作指明方向。同时，东亚峰会将能源与环保、

金融、教育、公共卫生、灾害管理、东盟互联互通确定为重点合作领域，初步形成经贸、能源、环境、教育部长的定期会晤机制。东亚峰会在机制安排上依赖于友好关系、政治意愿和社会规范，在议题设置上多从易达成协议的经济领域入手，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等影响地区稳定与繁荣的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密切协调，灵活应对，遵循协商一致、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东盟方式”推进对话合作。正因如此，东亚长期以来维持良好发展态势，东亚峰会各成员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文、安全等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东亚峰会未来挑战和机遇并存

2020年迎来东亚峰会成立15周年。多种区域合作机制并存竞争，自身机制化水平低和成员协调难度大，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印太战略”、地区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等都给东亚峰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东亚峰会与“10+3”合作、东盟地区论坛（ARF）以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种区域合作机制的并存与竞争。“10+3”合作已形成体系周密、层次完善、领域全面、合作务实的机制框架网络，是推动东亚合作的实质性渠道。ARF和APEC则分别是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地区合作机制。在东亚峰会逐步改变“务虚”性，议题设置呈现出具有功能性和实质性合作内容的背景下，与上述机制难免会有重叠和竞争。

其次，东亚峰会尚未建立正式的各领域和各层级支撑机制，成员数目众多，各国历史文化情况不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成员之间关系较为复杂，突破东亚地理范畴限制的扩容和跨地区性增加了东盟“小马

拉大车”的难度。虽然历届东亚峰会的主席声明一再强调要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这恰恰反映出东盟的主导地位不稳，需要不断获得其他成员的认同和确认。

此外，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冲击了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美在南海问题、湄公河合作等问题上对华施压，挑唆离间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增加了东亚峰会成员开展合作的阻力。

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疫情为东亚峰会成员发扬传统、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提供了契机。维护东亚合作良好局面，深入推进抗疫和发展合作，是包括中国在内所有东亚峰会成员共同的时代课题和应尽的历史责任。东亚峰会各成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当坚持峰会成立之初的“领导人引领的战略论坛”定位，平衡推进政治安全合作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沟通与务实合作，坚持东盟中心地位，坚持聚焦东亚和亚太，维护好现有区域合作架构，使合作保持在正确轨道上。

在当前形势下，东亚峰会各成员最为重要的是汇聚团结抗疫共识，推动重振经济合作，维护地区和平发展大局。中国愿同东亚峰会其他成员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互信协作，在政治层面为抗击疫情提供新动力，共同筑牢地区抗疫“防火墙”；在经济层面为经济复苏推出新举措，推动年内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把东亚打造成“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源；在安全层面为地区和平稳定提供坚强保障，坚持东亚特色的多边主义，恪守区域合作的基本原则，为确保东亚持久和平和繁荣发展多作积极贡献。



精细治理，推进城市紧凑集约、高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乡村、特色小镇，提高城镇要素吸引力、综合承载力、辐射带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要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事业建设，改善公共服务、统筹城乡发展、提高保障水平，使建设先行区的过程成为增进民生福祉的过程，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要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把黄河文化遗产作为重要资源，保护黄河文化遗产、挖掘黄河文化价值，推进文旅多元融合发展、文化产业加快发展，让多元纷呈、交相辉映、和谐共融的黄河文化在宁夏绽放光彩，使宁夏成为讲好黄河故事、展示黄河文明的重要窗口。

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文化联系更加密切，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将进一步推动不同文明的汇聚交融，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实现全面小康的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更加积极促进其他国家的发展，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动力。

中国全面实现小康促进了中国人民的全面发展，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为世界发展人权事业树立了中国榜样，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强大动力。展望未来，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将进一步推动创造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根据联合国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新加坡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却是亚洲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新加坡的老龄人口比例已由建国初的2.5%攀升至2019年的12.39%，预计到2030年老龄人口比例将超过全国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面对老龄化挑战，新加坡政府倡导“乐龄”养老，逐步建立起政府引导、制度保障、社会参与、居家为主的养老模式。

观念转变：从“老龄”到“乐龄”

“乐龄”是新加坡对60岁以上老人的特别尊称，寓意着希望他们的老年生活能够过得安乐祥和。新加坡鼓励“乐龄人士”老有所为，通过就业与社会保持互动，以保持良好的心态和体魄。新加坡政府于2012年颁布的《退休与重新雇佣法》规定，凡年满法定退休年龄，健康且工作表现良好的员工，将有权获得雇主的重新雇佣直到65岁。2017年通过的修正法案将重新雇佣的年龄上限推迟至67岁。同时，政府会为老年人提供就业培训，鼓励其乐意回归职场与社会。数据显示，几乎所有符合规定的老人都获得重新雇佣，不仅丰富了“乐龄人士”的退休生活，更将为其以后的生活赚取更多的保障。

年老或丧失工作能力的老人，将获得政府提供的保障，使其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中央公积金和组屋套现补贴计划给予“乐龄人士”财务保障，拥有组屋的居民可通过回购屋契或出租的方式获得额外收入；养老机构和社区中心可为“乐龄人士”提供医疗和护理服务。此外，新加坡政府特别注重提高“乐龄人士”的生活品质，每座组屋都拥有精心设计的老年人和儿童活动区域，老年人可以在这里休息，享受开阔自然的环境而不至于被禁锢在家中。不能在家做饭的老人可选择在组屋楼下的食厨用餐，从家门口到车站的封顶绿廊也为老人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制度保障：完善“乐龄”养老的政策体系

在新加坡，最主要的养老保障为中央公积金体系（CPE），其具有强制缴纳和高覆盖率等特点。凡受雇佣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都将获得中央公积金保障。公积金账户分设普通账户、专门账户和医疗储蓄账户，会员可按规定提取普通账户公积金用于购置组屋、人寿保险、信托股票和支付子女教学费用等；专门账户则是公积金成员的养老储蓄。医疗储蓄账户用于公积金成员及其直系亲属的门诊、住院及缴纳疾病保险等支出。此外，公积金成员在年满55周岁时将自动建立退休账户，其资金来源于专门账户，成员年满62周岁时可从退休账户支取养老金。

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体系是建立在就业基础上的养老制度，缺乏社会统筹和互助功能，且面临收支平衡的压力。因此，多年来新加坡政府不断调整养老金结构，为旧制度打上新补丁：为保障养老金的足额累积，新加坡政府通过预估通货膨胀率、国民预期寿命等因素，逐年调高公积金的最低存款标准并限制部分成员的提款规模；为应对新加坡民众人均期望寿命的不断增长，中央公积金管理局推出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以确保长寿老人可终身享受基本养老金收入；部分公积金会员可能因收入过低导致退休账户存款不足，新加坡政府出台了就业入息补助计划，由政府对低收入成员提供补贴以确保其退休账户缴足存款；为拓宽中央公积金的筹资渠道，新加坡政府启动了补充养老金制度；退休后又被重新雇佣的老人，政府将向雇主提供特别就业补贴和降低其公积金缴纳额度等优惠政策。

2002年，新加坡推出乐龄健保计划，意为为重度失能的老人提供基本护理保障。乐龄健保计划的缴费资金主要来源于公积金的医疗保健储蓄账户，投保者可使用自己及其配偶、直系亲属的医疗保健储蓄基金。乐龄健保计划是一项“选择退出”计划，凡年满40周岁但未满69周岁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除自愿退出外均自动参保，且参保者一旦开始缴纳保费，只要患有严重残疾均可提出保障要求。2007年9月之前，参保者每月可获得的赔付资金为300新元，给付期限为5年。2007年乐龄健保400计划推出以

从「新加坡养老模式」到「乐龄」

□曹阳昭

后每月的赔付资金提高到400新元，给付期限延长至6年。此外，新加坡卫生部将于2021年起接管现有的130万份乐龄健保计划保单，将便利保户升级至终身保护，得到更好保障。

充实服务：提供“乐龄”养老的多样选择

在新加坡，“乐龄人士”可获得机构、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新加坡的机构养老包括社区医院、慢性病医院、养老院和临终关怀机构。其中，社区医院可提供医疗服务、护理服务和康复服务等项目，对象主要为从急性医院出院且需要短期护理的患者；慢性病医院则为慢性病患者提供长期的医疗及护理；养老院为无人照护或家人无法提供照护的老年人提供长期护理服务；临终关怀医院可为绝症患者提供疼痛管理和治疗服务。

新加坡的社区养老是以社区日间护理、康复（日托）中心为基础的医疗服务，这些中心大多设置于社区之内，“乐龄人士”可在社区中心获得社区康复服务、痴呆日间护理服务和社区日托服务等。新加坡的社区以选区为基础，选区内的公民咨询委员会、市政理事会和居民委员会共同承担着社区的养老任务。

新加坡的居家养老是以家庭为基础提供的养老服务，主要由居家护理机构、居家姑息照护机构和综合诊所提供医疗保健、家庭护理、家庭姑息照护、老年餐桌、护送和居家个人照护等服务，服务对象一般为体弱多病的居家老人。新加坡人口以华裔为主，受儒家文化影响，政府和社会提倡全家庭观念，鼓励“乐龄人士”选择居家养老模式。而作为福利供给本地居民的组屋，在建造时便引入了几代同堂的设计理念，这类组屋以客厅相连接，两户既分又合，使老人与晚辈既能和谐又能照应。对于愿意购置此类房屋的家庭，新加坡政府将提供现金减免的特殊优惠，以此鼓励子女与父母同住，不仅为子女照顾父母提供便利，更能让“乐龄人士”享受儿孙绕膝的快乐。

从观念转化、制度完善到机构、社区和家庭的共同服务与协作，新加坡“乐龄”养老理念所体现出的对老年人自我价值的尊重、对法治保障的敬重和对传统家庭观念的继承和发扬，将会给同样面临老龄化挑战的中国带来更多启示。



（上接1版头条）宁夏作为欠发达省区，产业发展倚重倚能倚煤特征明显，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土地、能源、水资源利用粗放，多领域、多类型、多层次生态环境问题累积叠加，经济结构矛盾突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增长动力后劲不足、质量效益仍然偏低等深层次问题不断显现。生态空间决定发展空间，环境容量决定发展质量，如果不尽快扭转这种不顾资源消耗、不惜污染环境、不重生态保护的发展方式，必然导致资源撑不住、环境容不下、发展保不了。当前宁夏面临着发展不足、质量不高的双重难点，必须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

（上接1版二条）

中国实现全面小康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首次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实现小康就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运用新发展理念，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全面小康的“小康”是发展水平的要求，“全面”是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的要求。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和普遍联系的科学方法论。中国全面实现小康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灵魂和主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更加注重推动科

展，坚定不移推进先行区建设，坚持不懈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协同共生。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加快科技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实施结构改造、绿色改造、技术改造、智能改造“四大攻坚行动”，做强做优现代煤化工、清洁能源、新材料、绿色食品、电子信息五大产业，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发展，努力实现经济发展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牢固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把节约优先

学发展，更加注重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全面小康的中国，实现了经济持续中高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目标任务。可以说，中国实现全面小康从实践和理论上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旺盛生命力和巨大创造力，极大丰富了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世界意义。

中国实现全面小康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大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世

界的理念融入高质量发展全过程、各领域，落实水资源、能源、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管理，节约利用资源，综合利用资源，高效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性转变，特别是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优化用水结构，合理规划人口、城市、产业发展，综合利用雨水、中水、洪水，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着眼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谋划实施重大项目，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提高运行保障能力，构建绿色集约高效的现代水网、综合交通、能源保障、信息网络、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支撑体系。要优化城镇发展布局，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科学规划、提升品质、

的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这个时代的潮流。以和平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以和平发展促共赢，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当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遭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逆流，但我们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不断的改革和坚定的对外开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基垒台、积势蓄力。

中国实现全面小康是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标志性成果。中国实现全面小康意味着我们拥有了更强的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当今世界的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基础，意味着中国